社会科学辑刊
2022年第3期〔总第260期〕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
——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路锦非

［摘　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关键词］社会救助；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9YJA63005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4064）
［作者简介］路锦非，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2）03-0060-11

一、引言

民生问题历来是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核心问题。社会救助作为社会第一道安全防线，在兜底保障、巩固脱贫成果、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2020年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20〕18号，以下简称《意见》）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救助制度顶层设计进行的第一次系统谋划，对我国在新时代改革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也为如何实现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思路，以统筹救助资源、增强兜底功能、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完善法规制度，健全体制机制，强化政策落实，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2] 因此民生三感①是衡量我国社会救助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不断提高民生三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目标。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在较早研究国民幸福感的文献中，周绍杰等利用2010—2014年间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3]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民生三感”以来，有关社会保障政策对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研究成为热点。马红鸽、席恒基于中国家庭综合调查数据研究认为，社会保障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与健康水平来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通过提高公平感来缓解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4] 何晓斌等利用CGSS2015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拥有房产和参与社会保障都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②张子豪、谭燕芝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国民幸福感评价体系，验证五大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国民幸福感。[5] 部分学者关注单项社会保险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利用地方调查数据、CFPS、CSS、CGSS等不同数据信息展开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可以显著提升民众幸福感[6]、医疗保险能显著提升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7] 和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8]，并在对新医改政策进行反思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提升居民获得感的政策设计。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托底民生保障，其对居民的民生三感的影响引起学界关注。有研究基于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经济获得感的总体水平较低且相对获得感更差[9]，社会救助受助者的经济保障获得感较低[10]，托底性的社会救助制度、预防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和生产性的扶贫政策对困难家庭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分别是有限、中等和显著正向影响。[11]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均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存在很强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如何科学测量民生三感是重要学术问题。（1）获得感。有关获得感的测量，吕小康等基于纵向比较结果，将个人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和政府工作满意度这四个维度用于获得感的构建与测量；[12] 董洪杰等将中国人的获得感分为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内容、获得途径和获得分享等五个维度进行分别测量；[13] 石晶将获得感分为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两部分；[14] 郑建君将获得感定义为个体或群体的积极心理体验，是一种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并设计一系列问题来测量获得感；[15] 阳义南在公共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客观“获得”基础上将获得感归结为充足性、均等性、便利性、普惠性等四个方面；[16] 彭文波等认为获得感包括物质根源和心理根源等。[17]（2）安全感。郑建君认为安全感体现在对当下生存现状的无忧、可控，以及对未来自身及整个国家、社会的信心和可见预期上；[18] 王俊秀从需求理论出发，把安全感分为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劳动、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感八个方面；[19] 阳义南等在研究社会保险对劳动年龄人口安全感的影响时，采用“感到恐惧”“感到孤独”“感到忧愁”和“感到人们不友好”四项为测量安全感的指标等。[20]（3）幸福感。石晶将幸福感的体验建立在对于“过去的满意”“现在的满足”与“未来可控”的基础上；[21] 马立平等从包括身心健康、工作幸福、社会幸福、自我价值实现和家庭幸福等多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并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幸福指数等。[22] 学者们对民生三感测量的研究视角各有侧重较为分散，且大多数是立足于一种主观感受展开研究，研究三种感受且关注民生三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极为鲜见，只有郑建君对民生三感关系进行过研究。[23]

通过梳理上述从社会政策到社会保障再到社会救助政策对民生三感影响的逐渐聚焦的研究脉络，我们发现相关政策对民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不同侧面存在不同影响。社会政策需要更加精准和有针对性，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有效提升民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水平，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然而，有关社会救助对民生三感的研究在如下方面仍明显薄弱：一是大多聚焦于研究单项社会救助政策

①本文中的“民生三感”指的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②参见何晓斌、徐旻霞、郑路：《房产、社会保障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投资——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的一项实证研究》一文。

的影响，仅研究一个主观感受，如城乡低保政策影响经济获得感，就业政策影响困难家庭获得感，扶贫开发政策影响经济获得感等。而我国社会救助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受救助群体范围也比单个救助项目更广泛；二是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是居民家庭整体感受的不同侧面，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渗透难以清晰分开，因而有必要对民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整体展开研究；三是社会救助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现实，其具体标准、内容和实施带有鲜明的本土本地特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基于全国数据或者整体面上数据的研究，貌似全面但很可能忽略了社会救助本土本乡的具体情境，因此需要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展开更为细致精准的研究分析。然而现有文献基于地方微观调研的实证研究还非常缺乏。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基础，关系到最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和获得感、安全感、满意感的整体状态，有必要立足于基层社会政策实践，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三、社会救助对民生三感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上海浦东新区常住人口为558万。浦东新区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207亿元，同比去年增长7%，比全市平均高1个百分点，以23%的人口总量创造了上海市32%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3.67万美元，经济发展始终领先于上海平均水平，亦是全国的引领示范。[24] 浦东新区重视社会事业发展，积极推进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为基础，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受灾人员救助和临时救助为补充，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社会救助“9+1”制度体系建设。2020年全年合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11.19亿元,比上年增长3.4%，为31.1万人次发放失业保险金，增长15.7%。[25] 2021年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330元/人·月，低保家庭中16岁（含）以下未成年人低保标准为1730元/人·月，明显高于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水平694元/人·月。[26] 上海浦东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社会救助标准较高，其民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经济基础颇佳。本文关心在上海浦东新区这样的经济前沿地区，社会救助政策是否提升了该地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对浦东新区的研究将对整体把握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民生效果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为全国各地调整和完善社会救助政策、提升民生三感提供参考。

（一）社会救助对象三感测量设计

对于社会救助对象的民生三感测量，本研究参考吕小康、郑建君、阳义南等学者构建的测量方法[27]，并根据实际进行改造创新。在对基层实际政策进行可感知的测量时，考虑可操作性、调研样本易理解、实际感受容易提炼和表达三个方面因素，本文认为测量指标不宜过细。根据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本研究构建三感测量指标体系如表1。其中，获得感由实际获得和主观感受构成，依据浦东新区主要社会救助政策和项目进行“获得”的信息收集，包括城乡低保、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廉租房、就业救助、失业保险待遇以及其他社会救助项目所真实提供的救助金额及服务。主观感受是对每项救助项目收集受救助对象获得感的主观评价，包括救助的充足性、及时性、有用性三个方面。比如对获得城乡低保救助的样本，询问其有关城乡低保的充足性、及时性和有用性，来测量样本对于该救助项目的获得感，其他救助项目也同样操作。关于安全感，本研究以经济收入、医疗健康、子女教育、居住等关键保障内容的安全感为基础，增加有关恐惧、忧愁、社交友好与社会信任的测量指标，全面衡量安全感。幸福感是一种个人的综合主观感受。本研究从样本对当前生活满意感、对未来是否乐观和整体幸福感三个方面衡量幸福感。

根据上述社会救助对象民生三感测量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实施预调查对问卷进行修正调整后确定正式调查问卷内容。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结果良好①，问卷质量较高。调查问题中，除客观问题外所有主观问题答项均设置成基于感受程度划分的五级，数据量化处理为五级李克特量表分值。最高5分，最低1分，分值正向设置，分值越高民生三感的正面评价越高。

①信度检验：问卷的Cronbach系数0.89；效度检验：KMO值0.85，Bartlett球形检验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 1　社会救助对象民生三感测量指标

三感	指标	类型
获得感	城乡低保	数量指标,金额
	医疗救助	数量指标,金额
	教育救助	数量指标,金额
	廉租房等住房救助	数量指标,金额
	就业救助	数量指标,金额
	失业保险待遇	数量指标,金额
	其他社会救助、补助、帮扶待遇等	数量指标,金额
	接受相关救助的获得感受(充足性、及时性、有用性)	李克特五级评分
安全感	经济收入安全感	李克特五级评分
	医疗健康安全感	李克特五级评分
	教育安全感	李克特五级评分
	居住安全感	李克特五级评分
	是否感到恐惧	李克特五级评分
	是否感到忧愁	李克特五级评分
	是否感到不友好	李克特五级评分
	社会信任	李克特五级评分
幸福感	我对现在生活感到满意	李克特五级评分
	我对未来乐观	李克特五级评分
	我感觉幸福	李克特五级评分

（二）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覆盖上海浦东新区全部36个街镇，由各街镇对接受和曾经接受社会救助的对象家庭采取随机方法实施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4147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135份。样本的基本信息见表2。与全体受助家庭样本均值相比，获得城乡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救助、住房救助的家庭年收入低于均值；获得医疗救助、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的家庭年收入高于均值；接受教育救助的家庭年收入与均值持平。本文设计困难指数①代表家庭困难程度。发现低收入困难家庭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失业救助的家庭困难程度均高于全体均值，其中失业救助家庭的困难指数达到0.83，远高于受助样本均值0.57（表3、表4），说明这些家庭正处于非常困难的阶段。获医疗救助家庭的医疗费支出（8943元/年）显著高于全体受助家庭均值（5279元/年），获教育救助家庭的在读学生人数1.06远高于均值0.33，住房救助家庭的每月住房开支（4035元/月）远高于受助样本均值（1110元/月）等，这些统计数据均显示出浦东新区现行社会救助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精准性。

（三）社会救助对象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1. 当前接受与未接受社会救助家庭的民生三感分析

如表3，调研中接受社会救助家庭的困难指数为0.57，明显高于当前未接受救助的家庭0.14，表明前者家庭中残疾、长期卧床、长期失业、低收入等困难人数在家庭总人数中占比显著高于后者，家庭供养负担更重。

获得感方面，接受社会救助的被调查者整体获得感以及对救助及时性和流畅性的获得感得分均显著高于当前未接受救助的被调查家庭。安全感方面，接受和不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其整体安全感并无显著差异（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在医疗安全感、教育安全感和居住安全感三个侧面上，接受救助家庭显著高于未接受救助家庭，但在经济安全感上获得救助的家庭显著低于未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幸福感方面，接受救助家庭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未接受救助的受访家庭。调研数据的分析表明，接受社会救助的样本其获得感、医疗教育和居住安全感比当前没有接受救助的家庭高，但经济安全感和整体幸福感更低。这可以理解为当前接受救助的家庭正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主要体现为经济收入困难方面，而当前没有接受救助的家庭本身经济状况较接受救助家庭好，因而经济安全感更高。整体幸福感是有关当前、未来和整体生活状态的全面感受，因其为正在遭受困难而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所以整体幸福感较低符合实际情况。

部分家庭接受不止一项社会救助项目。接受

①困难指数=家庭中困难人数/家庭总人数。家庭困难人数指家中“身体或智力残疾无就业能力家庭成员人数”“长期卧床或者长期治疗吃药导致医疗负担人数”“有劳动能力但长期失业在家”“就业不稳定、收入低”(对应问卷四个问题)的人数加总。

表2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

平均年龄(岁)	47.5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女	
	1802	43.58	2333	56.42
居住情况	与父母/配偶/子女同住		独自居住	
	3267	79	818	20
户籍类型	城镇户籍		农村户籍	
	3384	82	751	18

家庭基本情况			
家庭结构指标	全体样本均值	城镇户籍被调查者均值	农村户籍被调查者均值
家庭人口数	2.81	2.8	2.82
70岁以上老人	0.41	0.39	0.49
16岁以下未成年人	0.38	0.38	0.35
在读学生人数	0.45	0.47	0.4
就业收入人数	1.13	1.14	1.12

接受社会救助情况		
接受/未接受救助	样本数	占比
获得救助	2231	54%
未接受救助	1904	46%

社会救助项目	接受救助人数	城镇户籍接受救助样本数	获救助人数/城镇户籍被调查样本数(%)	农村户籍接受救助样本数	获救助人数/农村户籍被调查样本数(%)
城乡低保	1242	1074	60.17	168	37.67
低收入补助	299	180	10.08	119	26.68
医疗救助	529	390	21.85	139	31.17
教育救助	225	196	10.98	29	6.50
住房救助	180	153	8.57	27	6.05
失业救助	19	18	1.01	1	0.22
临时救助	11	9	0.50	2	0.45

表3 调查样本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正在接受救助的被调查者	当前未接受救助的被调查者
家庭困难指数		0.57	0.14
获得感	整体获得感	4.21	3.82
	救助金额获得感	2.30	--
	救助及时性	4.31	3.92
	救助流畅性	4.12	3.71
安全感	整体安全感	3.85	3.80
	经济安全感	3.57	3.71
	医疗安全感	3.74	3.63
	教育安全感	3.88	3.71
	居住安全感	3.94	3.80
幸福感	整体幸福感	3.80	3.94

表4 获得不同救助项目调查样本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接受救助项目数		1种	2种	3种	4种及以上
样本家庭数及占比		1600/72%	462/21%	121/5%	48/2%
家庭基本信息	平均年收入(元)	58120	52977	53807	48494
	家庭平均人数	2.19	2.19	2.74	3.19
	困难指数	0.55	0.63	0.67	0.81
三感均分	获得感	4.24	4.14	4.17	3.91
	安全感	3.83	3.91	3.9	3.77
	幸福感	3.8	3.87	3.74	3.47

不同数目救助家庭数及民生三感数据见表4。随着接受社会救助项目增多，家庭年收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家庭平均人数和家庭困难指数逐渐增加，而与此同时，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逐渐下降。

2.不同社会救助项目的民生三感分析

获得感方面，总体上各社会救助项目的获得感得分都比较高，只有住房救助和就业救助低于4分，其中就业救助的整体获得感得分仅3.14分，显著低于其他救助项目和整体获得感均值，说明就业救助力度较弱，获得感不强。根据制度运行实际，各社会救助项目仍然以经济帮助为主要救助形式，因此救助金额获得感是衡量获得感最重要的指标。各项救助项目的救助金额获得感得分均很低，在满分5分的测评中全部低于3分，样本均值仅为2.3分，在三感测量维度中得分最低。其中就业救助的救助金额获得感仅为1.91分，表明提供的救助金额远远达不到就业困难家庭需要，与其整体获得感评价一致。安全感方面，整体安全感比获得感略低，多数社会救助项目的获助家庭整体安全感评分高于3.5分，但低于样本均值3.85分，其中获得住房救助家庭的安全感得分均值3.19分，明显偏低。安全感中经济安全感不高，全体受助样本均值为3.57分，其中获得城乡低保救助的家庭经济安全感相比较而言最低；幸福感在三感中整体得分最低，获得医疗救助、临时和其他救助家庭的幸福感得分高于样本均值，而城乡低保、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失业救助的家庭幸福感低于均值，其中住房救助家庭的幸福感最低。从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加总得分看，获得医疗救助和临时其他救助家庭的整体三感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而其他各项社会救助家庭低于平均水平，其中住房救助家庭的民生三感综合得分较低。整体上看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民生三感综合水平并不理想，在满分15分的民生三感测评中仅得分11.86分，说明总体上获得救助家庭的民生三感体验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所有民生三感测量指标中，救助金额获得感得分最低。根据民生三感测量设计，低于3分意味着救助金额充足程度未达到“能满足基本需要”。就业救助金额获得感得分仅为1.91分，充足程度介于“很少完全不够”和“有限但有帮助”之间。说明社会救助金额充足程度未能达到预期，因而获得感较低。分项目民生三感均值见表5。

表5　不同社会救助项目样本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社会救助项目		城乡低保	低收入困难家庭救助	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	临时+其他	接受救助家庭均值
家庭基础信息	平均救助时长(天)	2769	1451	--	--	--	1378	--	--
	平均救助金额	--	1282元/月	6360元/年	2931元/年	1691元/月	9439元/年	1978元/年	--
	平均年收入(元/年)	41036	49214	61466	58500	48008	83792	69384	58244
	家庭平均在读学生人数	--	--	--	1.06	--	--	--	0.33
	困难指数	0.51	0.74	0.6	0.54	0.63	0.83	0.52	0.57
获得感	整体获得感	4.15	4.15	4.2	4.11	3.97	3.14	4.2	4.21
	救助金额获得感	2.3	2.33	2.72	2.5	2	1.91	2.32	2.30
	救助及时性	4.24	4.32	4.31	4.19	4.05	3.64	4.22	4.31
	救助流畅性	4.06	3.92	4.09	4.02	3.89	2.64	4.08	4.12
安全感	整体安全感	3.72	3.82	4.03	3.78	3.19	3.91	4.02	3.85
	经济安全感	3.41	3.55	3.92	3.98	3.58	2.91	3.72	3.57
	医疗安全感	3.65	3.93	3.92	3.71	2.79	3.55	3.75	3.74
	教育安全感	3.81	3.99	4.07	3.98	3.47	3.82	4.01	3.88
	居住安全感	3.84	3.58	4.08	4	3.58	3.83	4.07	3.94
幸福感	整体幸福感	3.63	3.8	4.04	3.67	2.88	3.45	3.87	3.8

（四）社会救助对象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获得感G、安全感S和幸福感H作为因变量，核心自变量为是否接受救助，记为Rescue（接受为1，不接受为0）。将可能对接受救助对象家庭三感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年收入、每月必须支出、困难指数、接受救助项目数、性别、城镇户籍（城市户籍为1，农村户籍为0）等。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G = \alpha_{01} + \beta_{11} \cdot Rescue + \Phi_1 \cdot U + \epsilon_1$$
$$S = \alpha_{02} + \beta_{12} \cdot Rescue + \Phi_2 \cdot U + \epsilon_2$$
$$H = \alpha_{03} + \beta_{13} \cdot Rescue + \Phi_3 \cdot U + \epsilon_3$$

其中U为各个控制变量组成的列向量组，Φ_i为各回归方程中控制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由于控制变量单位相差悬殊，对年收入、月支出做了标准化处理以减少量纲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

表6 接受社会救助及救助数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

变量名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接受社会救助	0.489 (9.51)***	0.0212 (0.41)	−0.060 (−1.06)
接受救助项目数	−0.060 (−2.14)**	0.0461 (1.61)	−0.003 (−0.11)
性别	−0.018 (−0.6)	−0.0348 (−1.12)	0.040 (1.21)
年龄	0.004 (4.15)***	0.005 (4.35)***	0.005 (4.02)***
城镇户籍	−0.0045 (−0.11)	−0.144 (−3.75)***	−0.181 (−4.37)***
年收入	0.016 (1.04)	0.026 (1.69)*	0.053 (3.23)***
年必须支出	0.001 (0.08)	−0.012 (−0.84)	−0.007 (−0.45)
困难指数	−0.109 (−4.15)***	−0.196 (−7.32)***	−0.189 (−6.59)***
_cons	3.653 (54.47)***	3.763 (55.22)***	3.880 (52.82)***

注：***，**，*分别代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内是t值。

回归结果显示，相比未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接受社会救助能显著提高家庭的获得感，该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部分家庭接受多项社会救助，随接受救助项目的增加获得感下降，这一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城市户籍家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比农村家庭更低；家庭困难指数越高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越低，且负向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

不同社会救助项目针对不同的家庭困难，表7进一步分析经济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主要救助项目对家庭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影响。经济救助以城乡低保救助为代表，回归结果表明，获得城乡低保救助家庭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反而更低；获得医疗救助的家庭安全感和幸福感更高；而教育救助的三感影响不显著。控制变量中，接受救助的城镇户籍家庭表现出更低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家庭中就业不稳定人数越多，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越低，该效应在1%显著水平上稳定一致。

（五）社会救助对象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关系与作用机制分析

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者都是居民家庭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各有偏重。基于本文对民生三感的界定，获得感由客观获得和基于获得的主观感受共同构成，属于物质层面需要的满足，应居民生三感中的基础地位；安全感本文界定为对经济、医疗、教育、居住等生活侧面的安全感受以及个人是否恐惧、忧愁、对外界是否友好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因此安全感是比获得感更抽象的主观感受，但仍然与具体的生活侧面密切相关，应居于中间位置；幸福感本文界定为对当前生活满意、对未来生活乐观以及整体的幸福感受。很明显幸福感在民生三感中是最高层次和最为综合的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本文假设社会救助获得感影响其幸福感，且安全感作为中介或者调节因素也对居民幸福感有一定影响。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构建模型组分别检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分步法，设定回归方程组：

$$H = c \cdot G + \theta_1 \cdot U + \epsilon_1 \quad (1)$$
$$S = a \cdot G + \theta_2 \cdot U + \epsilon_2 \quad (2)$$
$$H = c' \cdot G + b \cdot S + \theta_3 \cdot U + \epsilon_3 \quad (3)$$

方程组中H、G、S分别代表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方程（1）检验获得感对幸福感的影响，方程（2）检验获得感对安全感的影响，方程（3）检验获得感和安全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若系数c、a、b均显著，说明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对幸福感产生影响，若c′不显著，则安全感是完全中介效应，若c′显著，则是部分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采用获得感与安全感的交互项进行分析。回归方程为：

$$H = \beta_1 G + \beta_2 S + \beta_3 G*S + \theta_4 U$$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8。中介效应检验中，第一步模型中获得感对幸福感有正向显著影响，第二步模型中获得感对安全感亦有正向显著影响，第三步模型同时加入获得感和安全感，安全感系数正向显著，说明获得感通过影响安全感进而影响幸福感，存在中介效应；模型三中获得感系数同时显著，说明安全感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获得感还直接影响幸福感。调节效应检验中，获得感和安全感分别对幸福感有显著正

表7　主要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

变量	城乡低保救助			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接受城乡低保救助	−0.147	−0.292	−0.343						
	(−3.65)***	(−6.42)***	(−6.88)***						
接受医疗救助				0.0183	0.217	0.340			
				(0.35)	(3.64)***	(5.22)***			
接受教育救助							0.097	−0.001	−0.048
							(1.16)	(−0.01)	(−0.46)
城镇户籍	−0.010	−0.131	−0.260	−0.029	−0.162	−0.291	−0.036	−0.176	−0.311
	(−0.22)	(−2.53)**	(−4.56)***	(−0.64)	(−3.11)***	(−5.11)***	(−0.79)	(−3.39)***	(−5.45)***
年收入	0.001	0.027	0.061	0.040	0.084	0.120	0.030	0.084	0.125
	(0.01)	(0.47)	(0.95)	(0.79)	(1.44)	(1.9)*	(0.58)	(1.45)	(1.96)**
年必需支出	−0.122	−0.045	0.106	−0.082	0.020	0.181	−0.091	0.014	0.171
	(−1.17)	(−0.38)	(0.82)	(−0.78)	(0.17)	(1.39)	(−0.86)	(0.12)	(1.31)
医疗支出				−0.044	−0.016	−0.004			
				(−2.23)**	(−0.73)	(−0.19)			
教育支出							0.027	0.001	−0.002
							(1.36)	(0.04)	(−0.07)
在读学生人数							−0.105	−0.134	−0.142
							(−2.63)***	(−2.96)***	−2.86)***
家庭困难指数	−0.118	−0.016	−0.053	−0.120	−0.011	−0.049	−0.0879	−0.038	−0.068
	(−2.68)***	(−6.42)	(−0.89)	(−2.7)***	(−0.22)	(−0.89)	(−1.88)*	(−0.72)	(−1.18)
家庭残疾人数	−0.074	−0.049	−0.065	−0.051	0.001	−0.003	−0.040	−0.007	−0.029
	(−2.16)**	(−1.27)	(−1.52)	(−1.49)	(0.01)	(−0.08)	(−1.15)	(−0.18)	(−0.51)
家庭患病人数	−0.149	−0.084	−0.024	−0.121	−0.076	−0.026	−0.113	−0.060	−0.007
	(−4.06)***	(−2.04)**	(−0.52)	(−3.19)***	(−1.77)*	(−0.55)	(−2.95)***	(−1.38)	(−0.16)
家庭失业人数	−0.0518	−0.0450	−0.056	−0.073	−0.073	−0.076	−0.046	−0.061	−0.077
	(−1.36)	(−1.16)	(−1.2)	(−1.94)*	(−1.7)*	(−1.62)	(−1.19)	(−1.39)	(−1.58)
就业不稳定人数	−0.145	−0.167	−0.159	−0.144	−0.161	−0.150	−0.110	−0.138	−0.133
	(−4.2)***	(−4.27)***	(−3.72)***	(−4.16)***	(−4.09)***	(−3.48)***	(−3.3)***	(−3.39)***	(−2.96)***
_cons	4.269	4.048	4.257	4.171	3.950	4.181	4.228	3.953	4.139
	(41.96)***	(35.27)***	(33.88)***	(41.23)***	(34.46)***	(33.38)***	(40.94)***	(33.72)***	(32.23)***

注：***，**，*分别代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内是t值。

向作用，但二者的交互项作用并不显著，说明获得感和安全感并不通过对方对幸福感产生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表明，城镇户籍家庭的民生三感指数比农村户籍家庭显著更低，收入越高民生三感感受越好，家庭困难指数越高民生三感越差，接受救助项目数越多民生三感体验更低。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之间，获得感和安全感均对幸福感有直接的作用机制，其中获得感是基础并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在获得感和安全感中，安全感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明显更大，说明若要提升民众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关注和提高安全感能有效提升整体幸福感。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从2015年中央首次提出“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到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8]，党和国家始终将人民福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社会救助是民生保障的托底政策，对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实证研究了社会救助政策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

表8 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

	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幸福感	安全感	幸福感	幸福感
获得感	0.419 (26.71)***	0.469 (33.21)***	0.041 (3.39)***	0.045 (3.61)***
安全感	--	--	0.8061482 (66.07)***	0.806 (66.05)***
获得感*安全感	--	--	--	0.014 (1.34)
城镇户籍	−0.200 (−5.21)***	−0.166 (−4.81)***	−0.066 (−2.5)**	−0.066 (−2.47)***
对数化收入	0.071 (5.14)***	0.032 (2.57)***	0.045 (4.76)***	0.045 (4.76)***
困难指数	−0.167 (−6.09)***	−0.149 (−6.05)***	−0.047 (−2.46)**	−0.048 (−2.51)***
接受救助数量	−0.073 (−3.8)***	0.004 (0.24)	−0.076 (−5.77)***	−0.075 (−5.70)***
截距项	1.700 (9.7)***	1.787 (11.37)***	0.256 (2.09)**	0.235 (1.90)*

注：***，**，*分别代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内是t值。

和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如下。

一是社会救助政策的民生三感特征。接受社会救助家庭的整体获得感和整体安全感都好于未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该结果是在前者的困难指数远高于后者的前提下测得，说明社会救助有积极的政策效果。但未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整体幸福感要好于接受救助的家庭。接受多项社会救助的家庭民生三感体验不佳，获得感和幸福感随着接受救助项目的增多而逐渐下降。其中，接受城乡低保救助的家庭其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更低，这并非说明城乡低保起了负面作用，而是接受城乡低保救助的居民家庭，都是经济上陷入困境达到低保救助标准的较困难家庭，相比其他非经济救助类型（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经济状况更差、整体民生三感体验更低。失业救助家庭的获得感最低，住房救助家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最低。所有民生三感测量指标中，“救助金额”一项的获得感最低，说明整体上社会救助的金额仍然偏低，不能满足困难群众需要，其中“就业救助”获得感最低，表明就业救助金额未能达到预期，民众获得感低。家庭困难指数对民生三感的负面影响最为稳定显著，将家庭困难人群按照家庭残疾人数、家庭患病人数、家庭失业人数和家庭就业不稳定人数等四类分别分析发现，就业不稳定人数是家庭民生三感负面影响的主要来源。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困难家庭的就业帮扶，促进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业获得稳定收入。此外，尽管接受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高于农村家庭，但城镇家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多次模型检验中都显著低于农村家庭，呈现稳健效应，应予特别重视。

二是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者中，由客观获得和获得感受构成的获得感居于基础性地位，安全感连接获得感和幸福感，而幸福感是最综合的整体主观感受。获得感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正向作用；安全感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此外，安全感在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获得感还通过提升安全感进一步影响幸福感。

（二）政策启示

1.浦东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相比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家庭的民生三感体验更差，贫困治理重点转向城镇是未来战略之举，浦东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农村社会救助工作也走在全国前列，农村居民的民生三感体验可能较好。但调查样本中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都较城镇居民家庭明显低，符合我国城乡

差异的整体特征。因此上海浦东新区的调研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整体特征上与全国城乡居民家庭差异类似，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参考性。当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64%〔29〕，面向农村的脱贫攻坚已经取得胜利。下一阶段贫困治理的重点应当转向城市，重点在于城市困难家庭的救助帮扶。这一方面是对我国人口区域结构发展的动态响应，也是对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方式的合理应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本身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城镇居民家庭则完全依赖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变现能力，一旦遭遇意外或者疾病等风险，就会陷入困境难以自主脱困。此外，城镇困难家庭与其生活环境对比，会加剧落差感因而体验更差。

2.社会救助项目的实施和分布应当更加科学合理，并不是救助越多民生三感的体验越高。应从追求提供更多救助转向精准救助，对居民家庭的现实需求给予针对性精准帮扶。现有救助仍然以经济物质为主，而服务类救助太少，应根据困难家庭所需，科学地调整救助类别和比重，缺什么帮什么。部分社会救助金额有必要合理提高，特别是失业救助金难以满足居民需要，居民获得感最低。

3.高度重视就业救助帮扶。社会救助的精准实施需要关注困难指数高的家庭，特别是家庭成员就业不稳定，会对家庭的整体状态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高度关注困难家庭的就业帮扶，帮助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就业来获得自主收入，从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对于因需要照料家庭病患成员而无法工作的，可以尝试有针对性地提供社区照料服务帮扶措施，解放被家庭责任禁锢的劳动力，帮助家庭摆脱困境。

4.重视安全感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代表对未来的预期和能够掌控的程度，因此对广大人民进行有关他们未来经济收入、生活前景的正面引导，将有助于提高其安全感。社会救助项目可以通过放松限制条件、承诺例外救济和有条件提高救助上限等方式，向民众传达国家和社会兜底保障的积极信号，通过提高民众的安全感提升幸福感。

我国正在实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发展纲领，社会救助是维持底线的重要社会制度，而该制度对困难群众家庭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有直接密切的影响。积极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优化政策实施，应通过更科学、精准的社会救助方式，帮助广大困难居民家庭切实有效提升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为共同富裕战略构筑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https://www.12371.cn/special/19da/bg/,2021年11月3日。

〔2〕林闽钢:《中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3〕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管理世界》2015年第6期。

〔4〕马红鸽、席恒:《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社会保障研究》2020年第1期。

〔5〕张子豪、谭燕芝:《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感》,《金融经济学研究》2018年第3期。

〔6〕岳经纶、尤泽锋:《挤压当前还是保障未来:中低收入阶层养老保险幸福效应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陈晨:《养老与医疗:社会保险参保行为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7〕桑林:《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6期。

〔8〕陈璐、熊毛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幸福效应》,《社会保障研究》2020年第5期。

〔9〕梁土坤:《环境因素、政策效应与低收入家庭经济获得感——基于2016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9期。

〔10〕侯斌、慈勤英:《社会救助对受助者获得感的影响——基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调研世界》2019年第7期。

〔11〕梁土坤:《三维制约:社会政策对困难家庭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8期。

〔12〕吕小康、黄妍:《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3〕董洪杰、谭旭运、豆雪姣、王俊秀:《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5期。

〔14〕〔21〕石晶:《新的美好生活,新的感受期盼——当前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国家治理》2017年第44期。

〔15〕〔18〕〔23〕郑建君:《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

与现状——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16〕阳义南:《民生公共服务的国民“获得感”:测量与解析——基于MIMIC模型的经验证据》,《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5期。

〔17〕彭文波、吴霞、谭小莉:《获得感:概念、机制与统计测量》,《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9〕王俊秀:《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社会》2008年第4期。

〔20〕阳义南、贾洪波、展凯:《社会保险对劳动年龄人口“安全感”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2期。

〔22〕马立平、杨作毅:《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关于北京居民幸福指数的编制与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4〕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委员会:《2020年浦东统计年鉴》,2021年3月9日,https://www.yearbookchina.com/navibooklist-n3020013109-1.html,2021年11月3日。

〔25〕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浦东新区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1年12月12日,https://www.pudong.gov.cn/14501.gkml_ghjhl/20211212/163945.html,2021年11月3日。

〔2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举行2021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2021年7月28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779387,2021年11月3日。

〔27〕吕小康、黄妍:《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郑建君:《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阳义南:《民生公共服务的国民“获得感”:测量与解析——基于MIMIC模型的经验证据》,《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5期。

〔29〕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2021年5月11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3.html,2021年11月3日。

【责任编辑:李　阳】

Research on Citizens' Sense of Gain, Security and Happiness for Social Assistance Policies: An Empirical Survey of Pudong New District in Shanghai

Lu Jinfei

Abstract: To enhance citizens' sense of gain, security and happiness is the intension of high quality growth strategy. Social assistance polices, as the bottom line of livelihood security of citize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pover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spired by existing literature domestic and abroad on measuring methods, the paper designs the measurement tool for the three senses of gain, security and happiness by considering China's specific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policy practice in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Taking Pudong New District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social assistance polic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ense of gain, while the specific social assistance projects show diversified impacts on the three senses of livelihoo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ense of gain, security and happiness is as follows: the sense of gain is the basis, which determines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happiness directly; the sense of security is in the intermediate position, through whos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the sense of gain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sense of happiness; and the sense of security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sense of happiness than the sense of gain. Therefore, to further improve citizens' sense of gain, security and happines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ffect of social assistance policy, distribute social assistance projects more reasonably and enhance citizens' ultimate sense of happiness by improving the sense of security.

Keyword: social assistance; sense of gain; sense of security; sense of happiness